

“一带一路”战略与我国边疆安全

李庚伦^{1,2}

(1.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云南 昆明 650106;

2. 云南大学 中国陆地边疆治理协同创新中心,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边疆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往往也是国家安全中首当其冲的部分。“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我国军事冲突、边界争端、边境管理、地缘安全等传统安全问题和三股势力、毒品走私、人口安全、国家认同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应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给我国边疆安全造成了新的挑战。随着中国的崛起,边疆安全问题将长期存在,我们必须牢牢抓住“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机遇,推动边疆安全的有效治理。

关键词: 一带一路; 边疆安全; 边疆治理

中图分类号: D69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1(2016)04-0032-05

边疆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往往也是国家安全中首当其冲的部分。边疆与安全天然联系在一起。在国家弱小时,边疆是国家安全的屏障;在国家强大时,边疆则是国家对外扩张的前沿。二战结束以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大量的民族国家成立,世界进入国家拥挤的时代。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加强了对资源的争夺,除传统的陆地边疆概念外,海洋边疆、天空边疆、太空边疆、信息边疆、利益边疆、战略边疆等概念纷纷出现。在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边疆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军事威胁、边界争端、地缘安全等传统安全和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毒品走私、艾滋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对我国边疆安全甚至国家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我国古代丝绸之路因边疆安全问题而生,也最终消失在中亚各国的战乱中。“治国必治边”^[1],“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的边疆安全治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使边疆安全治理面临巨大的挑战。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同志在出访中亚四国和东盟国家时,分别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设想。2015年3月29日,我国正式公布了“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具体方案措施:《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规定了广西、云南、西藏、新疆、甘肃、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陕

西、福建、上海等陆地边疆地区和沿海地区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推动了广西、云南、西藏、新疆、甘肃、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等陆地边疆省或自治区的经济发展,使我国封闭落后的边疆地区成为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

一、丝绸之路的历史回顾

“一带一路”战略是在我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应对当前国内外形势而提出来的国家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给古老的丝绸之路赋予了新的生命,强化了区域平衡发展和全方位对外开放,最终必将改变我国的地缘政治格局,也给我国的边疆安全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一) 丝绸之路的兴盛与我国边疆安全治理

国家是以暴力为支撑的公共权力对一定区域进行有效治理的政治形式。国家在对整个社会进行有效治理的过程中,必须占据并控制着一定的疆域。早期的国家都以占据和控制一定的陆地疆域为主。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最终在黄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底格里斯河流域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产生了四大文明古国。四大文明古国相距较远,三个在亚洲,一个在非洲。由于上古时期人口稀少,且碍于山川河流的阻隔,古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之间交集较少。美国著名学者威尔·杜兰认为:“世界上的几个文明古国,看起来颇像几个小岛。

收稿日期:2016-07-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陆地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14CZZ033);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项目“云南边疆多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基本经验研究”(项目编号:XKJS201502)。

作者简介:李庚伦(1985-),男,云南玉溪人,主要研究方向为地方政府与区域治理。

在这些小岛四周,尽是蛮族形成之海。”^[2]四大文明古国陆地疆域的边缘地带就是当时四大古国的边疆,即陆地边疆,也是王朝国家和蛮族之间军事冲突的前沿。中央王朝无力大规模开发边疆地区,因此,边疆地区仅仅被视为中央王朝的拱卫区或为中央王朝提供不可或缺的资源。四大文明古国是上古时期人类文明发展的顶峰,为了共同对抗周边蛮族的入侵,为了边疆的安全,丝绸之路也应运而生。

狭义的丝绸之路,仅指陆上丝绸之路,始于公元前2世纪与1世纪之间,连接着中国和欧洲、非洲的商业贸易。汉武帝为了维护边疆的安全,联合大月氏等国共同抗击匈奴,派张骞出使西域,从而形成了丝绸之路的主干道。广义的丝绸之路包括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形成的“西北丝绸之路”;北进蒙古高原,再进入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从西安到成都,再进入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还有从中国南海出发,进入印度洋、波斯湾,最终到达欧洲和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数千年来,中国将丝绸、瓷器、茶叶、火药、铜铁、竹器、漆器等传入了中亚、欧洲和非洲,西方的香料、药材、玻璃、葡萄等也传入了中国。丝绸之路的成功,使周边蛮族和小国被中华文明所吸引、被中原的国力所震慑,纷纷归附于中原王朝。同时,丝绸之路的形成,也为中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创造了一个平台,推动着世界整体向前发展。

边疆安全问题自国家形成就一直存在。自秦以来,我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朝历代都把中原地区看作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认为边疆地区是南蛮、西戎、北狄、东夷居住之地。王朝国家时期,边疆只是国家疆域的边缘地带,负责拱卫国家的中心区或为国家提供不可或缺的资源。唐朝是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唐太宗李世民甚至被西域各国尊称为天可汗。丝绸之路的成功,越发强化了周边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的向往,也奠定了王朝国家的统治基础。王朝国家时期的边疆安全治理,主要是处理中央王朝与周边小国之间的军事冲突以及边界争端。王朝国家在长期处理边疆安全的过程中,形成了“守在四夷”的理念。“‘守在四夷’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依靠中原的繁荣安定让王朝国家周边的少数民族自动归附、内附、臣服于中原王朝,并且让这些少数民族替中原王朝或中央王朝镇守王朝国家的边疆,最终达到‘内华夏而外夷狄’或者说是‘夷不乱华’。”^[3]在“守在四夷”理念的基础上,王朝国家还形成了“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不以蛮夷而劳中国”、“来则御之,去则守之”等理念。当然,王朝国家时期的边疆主要指陆地边疆,并且没有固

定的范围,与王朝国家的国力息息相关。王朝国家强大时,陆地边疆就往外推,否则就向内萎缩。这个时期国家安全面对的威胁也主要是军事冲突和边界争端等传统安全。

(二) 丝绸之路的衰败与我国边疆安全治理

丝绸之路主要涉及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按历史年代可以把丝绸之路划分为先秦、汉唐、宋元、明清4个时期。陆上丝绸之路在唐朝达到鼎盛时期,唐朝末年由于连年战乱而中断,被海上丝绸之路取而代之,后逐渐走向衰败。海上丝绸之路在明朝进入极盛时期,航线扩展至全球。郑和七下西洋就是明朝政府组织的航海活动。鸦片战争后,中国海权丧失,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走向衰败。民国时期也难以改变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建立前夕。

明清时期,古老的王朝国家开始了闭关锁国的时代。然而,从17世纪开始,古老的王朝国家遭遇了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强势入侵。我国逐渐形成了近代意义的边疆,也开启了近代意义上的边疆治理模式。沙皇俄国在17世纪将势力范围扩展到了中国的西北边境。为了维护我国的疆域安全,清王朝分别于1689年、1727年,和沙皇俄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条约》,标志着王朝国家的陆地疆域开始有了明确的边界。在现代边界形成的基础上,清王朝甚至改变了历朝历代“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的边疆治理模式。清王朝开始通过“改土归流”削弱少数民族政权的力量,把中央的力量深入边疆地方政权内直接统治边疆地区。然而,在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国力衰退,丝绸之路逐渐中断。边疆地区战火不断,并且丧失了部分陆地疆域,边疆安全问题日益凸显。

辛亥革命以来,我国开始了构建民族国家的进程。1941年4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颁布了《关于加强国内各民族及宗教间之融合、团结,以达成抗战胜利、建国成功之施政纲要》,不仅提出了边疆开发的战略,而且把边疆治理纳入到了国家治理的总体战略。但是,国民党政府统治时间并不长,甚至数次迁都,根本无暇顾及边疆的安全。

(三) 丝绸之路的重生与我国边疆安全治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国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在这个国家极度拥挤的时代,边疆不再是国家的边缘地带或夷狄之地,而成为了各个民族国家争夺的焦点。1997年,日本为了扩展利益边疆,提出“丝路外交”;1998年,吉尔吉斯斯坦为了

本国边疆的稳定和发展也提出了“丝绸之路”外交战略;2000年,俄罗斯为了维护其地缘政治优势,在莫斯科成立了欧亚经济共同体,并规划在2015年建立欧亚经济联盟;2011年,美国为了扩展其在亚洲的利益,提出了“新丝绸之路战略”,并企图通过“TPP”和“TTIP”组织挤压中国的生存空间,改变当前的地缘政治格局。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对于维护我国地缘政治安全和改变当前世界政治格局有着巨大的意义。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同志在出访中亚四国和东盟国家时,分别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设想。2015年3月29日,我国正式公布了“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具体方案措施:《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规定了广西、云南、西藏、新疆、甘肃、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等陆地边疆地区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大量的陆地边疆地区还未建立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少部分边疆地区还有国民党残留的部队及土匪。我国22000多公里长的陆地边界线也尚未进行划定、勘定工作,甚至为了维护国家主权,还发生1962年的中印战争、1969年中苏战争和1979年的中越战争。新中国成立以来,军事安全、政治安全一直是我国边疆安全的主要威胁。冷战结束后,军事威胁、边界争端、地缘安全等传统安全和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毒品走私、艾滋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对我国边疆安全甚至国家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边疆地区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治理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二、“一带一路”战略与传统安全的治理

我国边疆安全治理必须同时面对军事冲突、边界争端、边境管理、地缘安全等传统安全问题。“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我国解决这些难题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一) 军事冲突的应对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国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形成,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建设已经完成,而只是刚刚开始。在这个时期,百废待兴,整个国家的框架都必须重新构建,国家处于建设阶段。在国家建设阶段,边疆稳定是边疆治理

的主要任务,从而为国家的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国通过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建立生产建设兵团、推动边疆工业建设、实施特殊人口政策、实施优惠扶持政策等一系列的政策与制度设计,初步实现了边疆的稳定和国家的建设。^[4]

新中国成立初期,军事安全、政治安全一直是我国边疆安全的主要威胁。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在我国陆地边疆地区甚至还发生了1962年的中印战争、1969年中苏战争和1979年的中越战争。王朝国家时期,因中原王朝无力大举开发边疆,边疆区域仅仅是国家中心区域的拱卫区或夷蛮居住地。二战结束之后,大量新兴的民族国家成立,世界人口急剧增加,国家对资源的需求不断上升。边疆区域往往是文化碰撞、资源丰富的地方,当然也是重兵防守、剑拔弩张之地。“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必然是文化先行、高铁铺路、外交往来,最终才是经济交往。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过程中,为各国对资源开发、文化交融和利益共享打造了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从而有效的减少了战争的可能性。

(二) 边界争端的缓和

法国政治思想家让·博丹提出主权概念后,经过欧洲30年战争确立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并且最终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对疆域控制的主权性才最终获得认可,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边界。王朝国家时期,我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边界。中原王朝实力强大时,边疆区域就向外推;中原王朝实力衰退时,边疆区域就向内萎缩。从17世纪开始,古老的王朝国家遭遇了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强势入侵,我国逐渐形成了近代意义的边界。沙皇俄国在17世纪将势力范围扩展到了中国的西北边境。为了维护我国的疆域安全,清王朝分别于1689年、1727年,和沙皇俄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条约》,标志着王朝国家的陆地疆域开始有了明确的边界。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国力衰退,边疆战火不断,并且丧失了部分陆地疆域,边疆安全问题日益凸显。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陆地边界线长达22000多公里,相接壤的国家有12个,即越南、老挝、缅甸、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苏联、朝鲜。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和锡金国情的变化,新中国的陆地邻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目前,我国陆地相邻的国家有14个,即越南、老挝、缅甸、不丹、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

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蒙古、苏联、朝鲜。除中印、中不之间 2000 多公里的边界线外,其余边界已进行了划定、勘定工作,并获得了现代国际法的确认。“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特别是“孟中缅印”经济走廊的推动,对中印、中不之间达成共识,尽早解决边界争端大有裨益。

(三) 边境管理的改善

1978 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 3624.1 亿元,不仅低于印度,而且只有日本的 1/20,美国的 1/30。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然而,在 2014 年,广西国内生产总值 15672.97 亿元,云南国内生产总值 12814.59 亿元,西藏国内生产总值只有 920.80 亿元,新疆国内生产总值 9264.10 亿元,甘肃国内生产总值 6835.27 亿元,内蒙古国内生产总值 17769.50 亿元,黑龙江国内生产总值 15039.40 亿元,吉林国内生产总值 13803.81 亿元,而改革开放最早的广东国内生产总值却高达 67792.24 亿元。^[5]我国陆地边疆地区经济发展低于东部沿海地区,不仅影响我国 2020 年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的实现,而且也让我国边境管理产生太多不和谐因素。

边境是和国家边界相邻的陆地疆域内测。边境管理主要包括边境地区的管理和国家边界的管理,关系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1962 年 4 月,由于我国新疆伊犁、塔城经济困难以及苏联方面的鼓动,我国六万多边民逃往苏联,造成了影响恶劣的“伊塔事件”。同时,在我国西南边疆地区,云南边境的各少数民族也有逃往越南、缅甸的事件发生。“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使沿海、内地和陆疆形成一个整体,整合力量共同对外开放,也使我国陆地边疆地区成为了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区,有力的推动了陆地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再分配。其次,“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产业空间格局将发生巨变,边疆地区必将承接大量来自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为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众就业提供千载难逢的机会。最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还为西部大开发增添了新的动力,为我国西部边疆省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陆地边疆经济的发展,有效的改善了各边疆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使边民能更好的戍边。

(四) 地缘安全的平衡

人类自古以来都在陆地上建立国家,国家疆域都是陆地疆域,边疆自然也是陆地边疆。1890 年,马汉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明确提出“海权”概念,海洋疆域进入国家疆域的视野,海洋边疆也成为边疆的范畴。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四

周都是广阔的陆地疆域。中原王朝经常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因此,历朝历代都特别重视陆地疆域和陆地边疆的管辖,长城就是最好的证明。1840 年,清王朝遭到大英帝国的侵略,才意识到海洋国家的强大和海洋疆域的重要性。特别是在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以后,海洋疆域成为世界各国争夺的重点。

“国家安全与地理环境、地缘政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6]中国位于亚欧大陆东部,面向太平洋,同时拥有陆地边疆和海洋边疆,也使我们必须同时面对陆地地缘政治安全和海洋地缘政治安全。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对于维护我国陆地地缘政治安全和海洋地缘安全有着极大的意义。中国西部,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受重创而被迫撤退,增加了中国西部边疆安全的压力;中国北部,俄罗斯的一举一动直接决定了我国北方外部安全环境;中国东部,台湾和钓鱼岛问题尚未解决,而日本右翼势力却迅速壮大;中国南海,美国重返亚太,并且唆使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在东海、南海挑战中国。除此以外,印度、外蒙古、朝鲜等国家也蠢蠢欲动。

三、“一带一路”战略与非传统安全的治理

我国边疆安全治理必须同时面对三股势力、毒品走私、人口安全、政治认同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使我国的边疆安全治理面临着难以承受的挑战。

(一) 三股势力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军事安全、政治安全一直是影响边疆安全的主要因素。新世纪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暴力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等问题成为影响边疆安全和国家统一的主要因素。暴力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往往相互交织在一起,大搞暴力恐怖活动、制造宗教狂热、煽动民族仇恨,制造了一系列惨案,影响了边疆的安全和稳定。除拉萨 3.14 事件、乌鲁木齐 7.5 事件、昆明 3.01 事件等骇人听闻的惨案外,仅仅 2014 年上半年在新疆就发生了 4.23 新疆巴楚暴力恐怖事件、4.30 新疆乌鲁木齐火车南站事件、5.22 新疆乌鲁木齐菜市场事件、6.15 新疆和田事件、6.21 新疆叶城县袭击公安机关事件等。“三股势力”问题影响了各民族间的团结,造成了边疆地区和沿海地区间的隔阂,不利于边疆安全和国家统一。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使沿海、内地和边疆形成一个整体,整合力量共同对外开放,也使我国陆地边疆地区成为了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区,有力的推

动了陆地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再分配。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民众教育水平的提高,虽然不能完全避免极端暴力恐怖事件的发生,但这些极端力量再也无法动员大规模的政治事件,有利于国家凝聚力的提升。在“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我们“推进西藏与尼泊尔等国家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支持新疆“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并且还“支持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7]经济的发展、文化的沟通、高铁的贯通,将有利的打击暴力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势力,提升我国边疆和内地的同质化程度,实现我国边疆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

(二) 毒品走私问题

毒品走私问题严重威胁着我国边疆的安全和国家的稳定。毒品问题的威胁不仅仅在于吸毒、贩毒能传播艾滋病,更严重的在于毒品问题往往与国际恐怖活动、跨国犯罪联系在一起,引起整个边疆社会的混乱。“金三角”、“金新月”等世界头号毒源地毗邻我国陆地边疆省份,使我国广西、云南、新疆等边疆地区成为毒品中转站,我国也深受毒品问题的危害。2014年至2015年生长季,“金三角”种植罂粟71.2万亩,“金新月”种植罂粟336万亩。截至2014年底,我国在册吸毒人员295.5万名,实际吸毒人员1400万名,造成经济损失5000亿元。2014年,我国破获的刑事案件中因毒品问题引发的多达14.9万起,占同期刑事案件总数的12.1%,其中抢夺、抢劫、盗窃等侵财性案件7.2万起,涉毒犯罪案件4.7万起,绑架、杀人、强奸等严重暴力案件300余起。^[8]

“金三角”位于东南亚的老挝、缅甸、泰国交界处,去年种植罂粟71.2万亩,可制造700吨以上鸦片或70吨以上海洛因。“金三角”和我国广西、云南等陆地边疆地区相邻,广西、云南成为“金三角”毒品的中转站。“金新月”位于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交界处,去年种植罂粟336万亩,可制造6400吨以上鸦片或670吨以上海洛因。“金新月”和我国新疆相邻,使毒品走私与暴力恐怖势力联系在一起。“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中巴”、“孟中缅印”经济走廊的施行,将有力推动老挝、缅甸、泰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等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各国联合起来共同打击毒品问题创造一个新的平台。同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也将推动我国广西、云南、新疆等省或自治区的经济发展,有效降低边民走私毒品的动力。

(三) 人口安全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面临着非常不利的周边

环境,特别是面临着两大阵营对中国西北和西南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边疆必须以国家安全和国防建设为主,轻发展、重稳定成为陆地边疆治理的主要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正式对外开放,大力发展经济。但是,国家发展的核心任务是推动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以带动整个国家的发展。陆地边疆地区并不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更不是国家发展的重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东部沿海地区和陆地边疆地区不仅形成了一条难以逾越的经济鸿沟,而且陆地边疆地区大量的人口向东部沿海移动,造成了陆地边疆地区人口结构不合理、人口规模萎缩、人口生计贫困等人口安全问题。

“中国陆疆人口结构问题可以概括为二多一少。即单身多、老人多和总人口少。”^[9]根据徐黎丽教授研究发现,在我国陆地边疆地区形成了大量的光棍村,村里老人多、光棍多,总人口急剧下降,大多数女孩子都不愿嫁进村子。如2010年云南省麻栗坡县小坪寨的78户人家中,仅“30岁至50岁”的光棍就有10人。本国女孩不愿嫁入村子,又引发了越南媳妇跨国婚姻问题。陆地边疆地区的人口生计贫困问题也很普遍,严重影响了边民戍边的能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正式进入全面发展阶段,也将直接将边疆推向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特别是在陆地边疆地区打造经济发展新高地、产业园区等措施,将吸引大量的人口回流,形成建城戍边的新景象。

(四) 国家认同问题

认同(identity)是指个人对特定团体、组织或政治单位之间一致性的确认。“中国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主要就存在和体现于边疆地区。”^[10]陆地边疆地区也是认同问题、认同安全最为薄弱的地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放弃了清王朝和民国时期逐渐形成的以区域为主的边疆治理模式,而把边疆治理战略置于民族问题的总体框架下,制定了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等一系列政策。各少数民族在其政治地位提高的过程中,往往也强化了其对本民族的认同,弱化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认同。尽管对少数民族地区扶贫等政策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减少它的负面作用。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推动广西、云南、西藏、新疆、甘肃、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陆地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强了边疆少数民族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自豪感和认同感。“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我国不仅实现了经济(下转第91页)

性、多元化的思路拓展参与社区管理的方式,积极参与培育社区管理资本,助力社区自治氛围。法院可以主动服务的思路参与社区管理,实现司法为民前延。以能动司法的思路参与化解社区矛盾纠纷,构建司法为民长效机制。

六、结语

法院参与社区管理创新是人民司法“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客观需要。服务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是人民法院工作的永恒主题。法院应当处理好司法中立与主动服务的关系,坚持合理性和合法性的统一。充分地发挥民事审判的职能作用,切实做好诉调对接工作,着力平息矛盾纠纷,把依法司法与服务大局工作密切结合起来,通过提高办案效率、改进办案效果等方式,把执行法律和执行政策相结合,把对案件负责与对社会负责相结合,有力地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 [1] 陈希国,王宗冉.集约司法: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策略选择[J].山东审判,2011(6):46.
- [2] 冯少勇.人民法院要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发挥积极作用[N].太原日报,2011-03-05.
- [3] 洛阳老城法院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服务辖区发展[EB/OL].http://www.ha.chinanews.com/lanmu/news/1844/2014-06-30/

news-1844-264138. 2015-06-30.

- [4] 塔玛纳哈.一般法理学:以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为视角[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20.
- [5] 夏锦文.当代中国语境下的能动司法:意义阐释与有效规制[M]//人民法院能动司法制度建设初探.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93.
- [6] 娄成武,孙萍.社区管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2.
- [7] 李萍.论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质[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1):92.
- [8] 李国旗.城市社区管理法制化思考[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8):54.
- [9] 苏力.关于能动司法与大调解[J].中国法学,2010(1):49.
- [10] 马姝.社区治理中的相关法律问题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2005(4):26-28.
- [11] 应勇.论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J].人民司法,2011(9):8.
- [12] 齐树洁.司法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和中国国情[N].人民法院报,2011-09-01.
- [13] 王峰.法院与ADR关系重构——从社会管理创新的角度[J].人民司法,2011(7):45.
- [14] 曾令健.司法社会管理创新的困境及出路[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7):18.
- [15]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办公室.建设服务型法院实施纲要[N].2012-03-15.
- [16] 郑承茂.司法为民 服务大局[EB/OL].http://www.fxh.xm.govcn/fxh/fxlt/201004/t20100430_347939.2016-04-05.

责任编辑:胡 晓

(上接第36页)沟通,也实现了文化交流。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加强了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和内地的文化交流,增加了陆地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感。在我国民族国家的建设中,抓住“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机遇,强化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也要加强中华民族的建设,推进国家认同和国族建设的工作,最终在我国必将形成一个“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多元一体”格局。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习近平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加快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N].人民日报,2015-08-26(1).
- [2]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卷1[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167.

- [3] 李庚伦.论边疆治理理念的转型与重构[J].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3(6):23.
- [4] 李庚伦.试析中国共产党陆地边疆治理理论与实践[J].社会主义研究,2015(4).
- [5] 2014年统计年鉴[EB/OL].http://www.tjcn.org/help/27437.html,2014-07-20.
- [6] 陆俊元.中国地缘安全[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1:65.
-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N].人民日报,2015-03-29(4).
- [8] 2014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EB/OL].http://www.nncc626.com/2015-06/24/c_127945747_2.htm,2015-06-24.
- [9] 徐黎丽,王悦.中国陆疆人口问题治理模式初探[J].思想战线,2013(1):1.
- [10] 周平.边疆治理视野中的认同问题[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13.

责任编辑:谭大友